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怎么办？

——关于新人的故事

ZEN ME BAN GUAN YU XIN REN DE GU SHI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 / 著

孟庆枢 / 译

南方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怎么办？

——关于新人的故事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孟庆枢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怎么办?/(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孟庆枢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1999.8(2006.1重印)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ISBN 7-80609-788-0

I. 怎… II. ①车… ②孟…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
代 N. I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855 号

怎么办?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孟庆枢 译

责任编辑:	赵云鹤	邮政编码:	570203
出版发行:	南方出版社		
社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19号华宇大厦12楼		
电话:	(0898) 65371546	传真:	(0898) 65371264
印刷:	保定市恒艺印务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5.25	字 数:	391千字
版次:	1999年8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09-788-0/I·69		
定价:	28.00元		

译 序

—

尼古拉·加夫里罗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 7. 24—1889. 10. 29）这位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理论家、思想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虽然他离开我们已将近一百一十年，但是他的著作、思想和人格魅力仍然像耀眼的星光照射在人们的心田。尤其《怎么办？》这部长篇小说的中译本在我国发行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爱，成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不朽的名著之一。

尼·车尔尼雪夫斯基生于旧俄萨拉托夫的一个神父家庭。少年时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勤奋好学，非常具有天赋的孩子，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而且在青少年时代已开始掌握几种外语：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英语。他先进萨拉托夫正教小学，十四岁时入正教中学。这位求知欲极强、感受力极为敏锐的少年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思考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存在的丑恶的社会现实，开始认识到贵族——资产阶级和宗教的虚伪与欺骗。

一八四六年中学没有毕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入了彼得堡大学语文历史系学习哲学。他对当时的学校和一批反动的教授们的课业十分不满，为了满足他不断高涨的精神追求，他以顽强的自学继续人生的探索。他涉猎的范围极广。哲学、历史、经济、文化、文学等各类著作尽入眼底。他曾系统地钻研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但是他发现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原则和结论存在的深刻

矛盾，转而又钻研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受到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一方面积极继承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前驱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思想，是他们的最优秀的学生，同时又积极探讨西方的先进思想，并且密切注视着俄国社会现实，把理论与斗争实践结合在一起。青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早熟的思想家、革命家，最可宝贵的品格是面对现实的独立思考精神。他在神学校读书时接触黑格尔哲学，但那时只是“黑格尔体系的俄国式的叙述”，到了大学时代他已经以犀利的目光批判他的“先生”。同时他的少见的政治敏感性使他始终关注世界（当然主要是西方）的各种思潮。为了探求俄国未来发展之路，他钻研过亚当·斯密的学说（这在《怎么办？》中有描述）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等人的著作，即使对这些当时思想界的巨人，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唯书，不唯上”，而是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批判接受，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总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又积极吸收域外文化，将其融合于一身。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方面是杰出的代表。

一八五〇年他在彼得堡大学毕业，成绩优异，被派往萨拉托夫中学任教，教授语文课。这段时间对于他形成革命思想和从事革命实践都非常重要。他把中学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讲坛，授课成了与学生之间革命思想的对话，为此，他受到当局和学校的反对，他对这一时期的状况曾在给他后来的妻子奥尔加·索克拉托夫娜·瓦西里耶娃的信中写道：“由于我的这种思想方式，随时随地都要等候宪兵的传讯，他们会把我弄到彼得堡，关在要塞里，不知道会蹲上多少时间，我在这里做的，是会招致服苦役之灾的事……”为了扩大他活动的舞台，他于一八五三年离开萨拉托夫去彼得堡。在这一年他与自己终生的革命伴侣奥尔加·索克拉托夫娜结婚。在彼得堡他开始为《祖国纪事》撰稿，同年秋与尼·涅克拉索夫相识，加入《现代人》编辑部，后来成为该杂志的实际领导者。《现代人》杂志在当时俄国社会思想发展中起着巨

大作用，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他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在一八五五至一八六二年之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美学、哲学和社会政论的重要文章，如《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莱辛，他的时代，他的一生与活动》以及论述普希金、列·托尔斯泰、谢德林、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的专论。哲学著作作为《杂志述评》（1857）、《资本与劳动》（1859）、《哲学中的人本主义》（1860）、《论战之美》（1861）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唯物主义美学发展史和现实主义文艺批评史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美是生活”的定义，认为文艺的主要目的是“再现生活”的主张，文艺的最高使命是使之成为“生活的教科书”的论述，对于俄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成为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旗手，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他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新的阶段。在他的哲学著作中集中结合俄国农奴解放问题进行了探索，他提出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通过农民村社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思想上提出“合理利己主义”的理论，这些思想虽然有局限性，但在当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它们也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

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沙俄专制制度的腐败透顶和必然溃灭的趋势。农奴的反抗日甚一日，沙皇政府不得不实行从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1861年），但是改革后的俄国反而更加黑暗、腐败。在这种形势下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团结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更加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农奴制度的拥护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反动嘴脸，为农奴的真正解放而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与俄国最大的一个反对农奴制度的秘密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成立于1861年）有着密切联系。车尔尼雪夫斯基断言农民为取得自由与土地只有走革命之路，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写道：“呼唤罗斯拿起斧头！”他号召农民以起义来推翻沙皇专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使沙皇当局万分惊恐，一八六二年六月，《现代人》

杂志被勒令停刊八个月，同年七月七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逮捕，投到彼得堡罗要塞单人牢房。

在彼得堡罗要塞的六百七十八个苦难的日日夜夜，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屈不挠，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斗争，不朽的名著《怎么办？——新人的故事》即诞生在这特殊的环境里。

在这两年拘押期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大义凛然，为坚持真理，寸步不让。沙皇专制机关找不到任何罪证，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们卑鄙地采取伪造证据的手段，强行判处他服七年苦役后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对于这位革命家，沙皇专制政权真是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在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九日在彼得堡梅特宁广场上演了一出极为卑鄙、惨无人道的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处以“假死刑”的丑剧。对此有关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在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九日雾气蒙蒙的早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军警押解下走上梅特宁广场的黑黝黝的高高的断头台。在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黑牌子，上面写着：“国事犯”。官员们开始宣读判决书。犯人的镣铐锁在柱子上，强迫他跪下，刽子手在他的头上悬起长剑……

……

当沙皇刽子手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头上挥舞长剑之时，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睁开眼睛看着断头台周围的人们。他看见了自己的敌人。在这些敌人的眼中闪着幸灾乐祸的眼神。同时他也看到许多冒着落入沙皇刽子手魔掌危险而来到刑场的忠诚的朋友们。当他的手铐声响起之际，广场一片激愤，发出了抗议的呼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脚下抛来了花束……

沙皇政府的这一卑鄙行径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赫尔岑在

《钟声》杂志发表文章向政府提出抗议。同年七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押赴伊尔库茨克盐场服苦役，八月份又转至卡达亚矿山，两年后又被解送到亚历山大工场。就这样反复辗转，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七年苦役期满后还延长苦役期，把他发配到极为荒凉的维柳伊斯克。连在这样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车尔尼雪夫斯基仍然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

二十多年的监禁、苦役、流放生活严重地摧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健康，但是仍然摧毁不了他的精神。不管敌人如何引诱，他坚如磐石，矢志不移。在一八八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允许回到阿斯特拉罕，但仍是在警察监视下生活，后来又允许他回到家乡萨拉托夫。

在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夜，车尔尼雪夫斯基病重逝世。

二

《怎么办？》一书是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作家人生探索的艺术结晶。

这本书是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对俄国未来社会、未来人的理想蓝图的诗意勾画。“文学是入学”，作为“生活教科书”的《怎么办？》更有着十分迫切的使命感。作家从社会制度、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设计，他首先突破了以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达到的高度，塑造了一批“新人”形象。

众所周知，在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艺术长廊里有一组引人注目的形象，那就是源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奥涅金愤世嫉俗，不满现实，渴望着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生活。他虽然出生于贵族之家，但纸醉金迷的生活、虚度年华的无聊使他感到虽生犹死，他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如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和卢梭的启蒙主义思想的浸润，憧憬在腐败、毫无希望的俄国社会实行改革。但是，他脱离人民，加上时代的局限，使他无力超越自己，最后只能是玩世不恭，成

为“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也永远不会站在人民方面”的“多余人”。接着接踵而至的“多余人”，如毕巧林、罗亭、奥勃洛摩夫越来越显示了他们的软弱与无望。屠格涅夫在一八七六年问世的《处女地》中的“多余人”形象涅日达诺夫对准额头开枪自尽，该是对这一类人的“追求”画上一个句号。历史地、辩证地看“多余人”，我们自然会十分清楚这类人的先进性、局限性和他们最终不可挽回的失败命运。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时代和自己的独特人生经历的条件使他能够从这走不通的足迹中寻觅出一条新路，这就是他塑造“新人”形象的历史必然。

《怎么办？》的副题即是“新人的故事”。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自己对现实主义的敏锐观察，对人生理想的寄托，把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未来社会构想都满腔热情地融注于“新人”形象。

首先作家强调了“新人”必须挣脱旧世界在物质、精神诸方面对自己的桎梏，走向新生。正像书中女主人公薇拉·巴芙洛夫娜，她已经从污浊的、使人窒息的“地下室”中逃出来，走向自由的天地。薇拉生活在一个完全以金钱为中心的鄙俗的小市民家庭里，薇拉的母亲玛丽雅·阿列克塞芙娜为了追逐财富、爬上上流社会无所不用其极，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人格，可以说她是几乎全都被“异化”的人。她不仅对自己的丈夫颐指气使，因为他的前程是由自己挣来的，而且对女儿也妄图牢牢地拴在她的战车上，把薇拉作为一个重要筹码，作为待价而沽的商品时时准备卖上高价，继续自己未竟的角逐。显然在这样的家庭里犹如身陷泥潭。尽管薇拉天性善良、纯洁，她有美好追求，但是，如果不离开这龌龊的环境，她只能是又一个牺牲品。在人生的重要关头，最先出现的“新人”之一罗普霍夫向她伸出援救之手，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使她摆脱掉这种处境的情况下，他毅然同她结婚，过上了新生活。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深刻在于他没有把“新人”的成长止于她的出走，像薇拉一样成为一只飞出笼子的金丝鸟，而是以更深邃

的目光看到了新人成长的艰难，路漫漫其修远，并且指出“新人”的成长必须和改造整个社会制度，包括改造自身结合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薇拉的四个梦勾画了“新人”成长的不同阶段、不同层面。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尤其是妇女只有在经济上独立她才有可能不成为男人的附庸，基于这一点，薇拉创办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缝纫工场。在那里每个女工既是生产者，也是管理者，她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

同时作家又从人的最本质的需要发出，提出“新人”必须是有独立性格、按自己意愿行动的人。作品将罗普霍夫、薇拉、吉尔沙诺夫的爱情纠葛作为本书的主线，足见作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罗普霍夫与薇拉结婚，薇拉不能不说很幸福，但是，经历一定时日的生活，她越来越在内心感到“性格”的不协调，而且潜生了对吉尔沙诺夫的热恋。罗普霍夫作为一个品质高尚的“新人”，敏感地认识到他和薇拉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对方感恩的回报，而在深层次上对方并没有得到感情上的满足。于是他假装自杀，让薇拉解脱并与吉尔沙诺夫这位在性格上与薇拉完全协调的朋友组成新的家庭。在这里显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在追求离奇的情节，而是从更深层次去探讨妇女的独立、自由、幸福问题。甚至后来罗普霍夫化名毕蒙特回国与卡杰琳娜相爱之时，毕蒙特（罗普霍夫）进一步提出男女之间的全面体验才是双方幸福的保障的主张，他决不是简单地让妇女放纵，而是深入探讨人的天性如何受到尊重，双方才能自由幸福的问题。

对待这一问题，作为一代哲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的概念。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新人”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包括薇拉都是以此为准则来支配自己的行动。罗普霍夫本来让薇拉与她真心喜欢的吉尔沙诺夫结合应该说是利他的举动，但是，他认为：“我决定不妨碍她的幸福，是为自己的利益；我的行为也有高尚的一面，但这行为的原动力都是我自己天性中的利己欲。”在这里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人的深层次的探讨，他没有一点简单化的倾向。但是，作家显然也处于

一种自我矛盾的状态，即罗普霍夫的行动是利他的，而出发点又是利己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是如何统一起来的，作家显然还不能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极其黑暗的沙皇专制制度下强调个体人的充分权利，而且是普通平民百姓的权利，它的意义是积极的，它不啻是从根本上动摇旧社会的根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作品里描绘了许多蓝图，大到社会结构，小到一日三餐，连在那个时代刚刚流行的铝制品都使他激动不已。在许多设计中毋庸讳言充满了一种乌托邦色彩。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绝对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清醒地意识到建设未来社会是艰巨的事业，甚至不是几代人就能完成的。他在作品里塑造了“特殊新人”形象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作品中的拉赫美托夫和“穿丧服的太太”是在当时刚刚出现、尚处于凤毛麟角的阶段的“特殊新人”，这是历史的真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们称作“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的盐”。他们都出生于贵族家庭，有极高的教养和突出的才智，他们背叛从属的阶级，准备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为平民百姓的幸福而奋斗的事业。拉赫美托夫和“穿丧服的太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充分认识到要改造旧世界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就要身体力行地付出代价，甚至作出牺牲。为此，拉赫美托夫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艰难职业，从各个方面磨砺自己。他为了有强健的体魄，去干各种粗活，作石工，当木匠，去拉纤等等。他为了在将来的革命中能经受得住反动政府的折磨，让自己多受皮肉之苦，他躺在扎满了钉尖冲上的毡毯上，使自己处在血泊之中。他把自己生活中的分分秒秒都精确地计算，把它作为对革命事业的投入。那位“穿丧服的太太”宁肯割弃甜蜜的私生活，支持自己的丈夫去从事危险的工作，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不能不说是最大的牺牲。虽然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有一定的理想化的痕迹，“特殊新人”似乎离普通人有相当距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他们的全部言行，就会意识到那是在一个非常时期、非常环境下

的产物，我们会发现“特殊新人”形象仍然是有血有肉的，而不是概念化的。拉赫美托夫和薇拉曾做过彻夜长谈，薇拉曾惊讶自己对他的看法有失片面，因为在过去只是注意到他是一个“阴沉的野兽”的“怪物”的一面。然而，在拉赫美托夫身上也有七情六欲，也不乏温柔、体贴的人的一面。但是，他为了达到一个伟大的目的，是不得不作出牺牲的，连同自己的生活方式都要服从大局。同样，“穿丧服的太太”虽然“刚烈”、“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位年轻女子在她看到吉尔沙诺夫夫妇和毕蒙特夫妇甜甜蜜蜜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引起了精神上的巨大震动，甚至昏厥过去。作家对于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没有简单化处理。作家极为深情地用民歌、诗的形式让“穿丧服的太太”抒发自己的多彩的感情世界，爱情生活，她纠正了自己不让革命青年恋爱、结婚的忠告，而鼓励革命青年大胆地去爱，而只是不要欺骗，而且还要清醒，要敢于有勇气承受命运可能发生的一切。作家在最后一章用浪漫的笔调写了两年之后的欢快场景，“穿丧服的太太”身着节日盛装，容光焕发，和刚出狱的丈夫一起去迎接盛大的节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革命寄予了满腔热情的希望。

这篇小说是在监狱里写成的，面对沙皇专制机关的严格审查，不得不以伪装的方式让它面世，为此作品里许多情节多含寓意、双关（如未婚妻的寓意），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就必须把握作家的战斗历程和作品的时代背景，不然这种解读与作品本来的意愿会相去很远。

任何文学作品都浇铸着作家的人生追求，跳动着作家的一颗心。同样，读过《怎么办？》，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呼吸，听得见他心灵的倾述。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把拉赫美托夫、“穿丧服的太太”看作是作家本人和他夫人的写照，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两个人物身上有作家的影子，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他独特的人生历程，是不会写出《怎么办？》的。

他把这部作品题辞献给他的夫人也不是简单地表达对妻子的爱，这是两位职业革命家心灵的交流，它远远超过一般的夫妻之

爱（当然这种爱同样是崇高、伟大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离开我们已经一百多年，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怎么办？》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读者手中自然不会同于过去时代读者所接受的层面。但是，作为一部经典著作，它的丰富蕴含是不怕日月流逝的淘洗的，作品里体现的一种“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生感悟，我想是任何读者，不问职业，不问年龄都会认同的。如何作一个有追求的人，一个高尚的人，这对于任何时代的读者来说都还可以在这部经典作品中寻找可贵的启示。我想基于这一点，《怎么办？》还将继续为中国读者所欢迎。

三

是凡做过文字翻译工作的人都尝过这里的甘苦。文学翻译确实是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机械的技术操作。说翻译是种创造绝不是说译者可以不忠实于原作，不对原文负责信马由缰地演绎起来，如果有这种译文是应该受到批评的。西方将翻译诙谐地称作为“创造性的叛逆”，我觉得这倒说出了翻译上的一些本质问题。我认为翻译是一次给定条件的艺术创造。首先译者在面对原作时要通过原来的文字去和原作者沟通，尽量达到原作者所想、所写（包括文字后面的东西）的境地，然后译者再尽量代表作者用译者使用的语言把他的文本形神兼备地转述给另一国的读者。从我国译界历史来看基本如此。我国是个翻译历史悠久的国度，如果只从引进佛经就有了翻译事业算起也该有近二千年历史，因为“史学界一般以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作者）求法故事为佛教入华的标志”。^①从这以后译业绵延不断，蔚为壮观，据梁启超统计，从汉明帝十年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67—730年）在约六百年间译经九百六十八部、四千五百零七卷，参加的主要译者为一百七十六人之多，最著名的译经大师如鸠摩罗什、真谛、玄

^① 净慧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化》，11页。

樊、义净等名垂千古。到了近代在中西文化交融后，译业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没。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中国译界还是十分重视对译品的忠实的。话说得稍远了一些，回顾这些的目的是想探讨一下至今为止一直还有争议的翻译标准问题。从严复以来一直有“信、达、雅”之说，近人还有“信、达、切”之说，还有用“从形似到神似”的表达，等等。我个人总认为译者首先要对原作者、原作负责，正如前边所说，这是被给定的条件，不能随心所欲，擅自离开，自由发挥。同时，我也深深感到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每本书的任何一个读者都是一个接受屏幕，他在阅读作品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以自己的学识、人生经历、包括兴趣等对作品进行阐释、充填和再创造。阅读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毫无疑问，翻译也是个动态过程。每个译者在尽力接近原作、原作者的前提下自觉不自觉地已经在用自己的精神阐释作品，进行再创造。我唯一时刻记在心里的是：这种创造也一定要不离开给定的条件。

至于重译在某种意义上很像是朝着同一方向的爬山运动，因为目标一致，最后不同的译者应该是在相同的峰顶重逢。译者译完一部书得到的也犹如登山运动员爬到峰顶之后所领略到的享受。同样，前面的译者也恰似先登山者，他们的登攀开拓了道路，提供了启示，对于后来的登山者是借鉴和范例，也有鼓舞。《怎么办？》一书在我国已有两种译本，最早译作《做什么？》，时代的关系，译本已很难见；蒋路先生的译作《怎么办？》曾是我过去从中文拜读过的典范之作。这次重译得到了译界许多前辈的鼓励与支持，对于我来说把它作为自己学习、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自己人生追求的一种享受。记得在一九九一年我去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作高访学者访学期间，遍访了许多从少年时代就一直崇仰的俄苏作家的踪迹。我顿时觉得许多作家、作品突然离自己近了许多，似乎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呼吸，这种感觉是使人激动的。当我走在涅瓦大街上，脑海里一下子涌出那么多作家、作品，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

斯基、契诃夫到当代许多作家，几乎都曾经在你停步的地方走过，于是我就尽力多跑多看，心想有一天如果译述他们的作品把这种感受也融进去，也算是一种吮吸过他们的精神乳汁的回报。今天译完了《怎么办？》，我仍觉得惴惴不安，不知这种回报如何，只能由读者、专家评说。

这次重译我选择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 ленинград》《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4》两种版本。原因是前者有很权威的注释，现在译文中绝大多数注释均出自于该版本。但是，前一个版本的第四章第十七节的文字却是沙皇检查机关删定的文本，而后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原来的文本。为了恢复原作应有风貌，这一节的译文依照后者译出。考虑到这本书是给广大读者的，我没有再把被沙皇检查机关删定的那节译文收录进去，我觉得这已不影响对该书的全面认识，再说蒋路先生的译作中已有收录。

在译介过程中涉及到法文的有关内容我请教了挚友北京大学罗芄教授，承蒙他给予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同时对于有些不好处理的地方也与挚友北京大学俄文系李毓榛教授互相切磋，还有几位邂逅的俄国朋友，也当面向他们请教过。我特别要对译界前辈蒋路先生表示诚挚谢意。他曾多次赐函指教、鼓励、帮助。长者之风，没齿难忘。

从去年严冬到今年盛夏历时十个月的工作，回忆起来颇多感受。我既然干了这件事，吃苦也好，享乐也好，心里自知，不必赘言。但为了按时交稿，还拉了妻子帮誊写一部分稿子，想起来有点于心不忍，人家工作也不少，这种累人的事还要人家干，实在难为情。

今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诞辰一百七十周年，明年则是他逝世一百一十周年，译前还没太想过这一点，译完了忽然想到，也许是巧合，把这个拙译权且作为一种敬意捧献给这位我永远崇敬的人。

孟庆枢

献给我的朋友奥·索·车^①

① 即作者夫人奥尔加·索克拉托芙娜·车尔尼雪夫斯卡雅（1833—1918）。

目 录

I	傻瓜.....	(1)
II	初探傻瓜案.....	(4)
III	序	(10)
第一章	薇拉·巴芙洛夫娜在娘家的生活	(13)
第二章	初恋与合法婚姻	(57)
第三章	婚后和第二次恋爱.....	(151)
第四章	第二次结婚.....	(310)
第五章	新的人物与结局.....	(402)
第六章	布景的转换.....	(467)
	后记.....	(469)